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简·亨特 著 *Jane Hunter*

李娟 译  
杨志 审校

优雅的福音

20

世纪初的在华  
美国女传教士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优雅的福音

20

世纪初的在华  
美国女传教士

简·亨特 著

李娟 译

杨志 审校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雅的福音：20 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 / (美)

亨特著；李娟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

ISBN 978-7-108-05025-0

I. ①优… II. ①亨… ②李… III. ①女性-传教士

-研究-美国 IV. ①B979.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4341 号



责任编辑 黄新祥

装帧设计 张红 朱丽娟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9月北京第1版

201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270千字 图数14幅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给

伊丽莎白·莫里森·亨特

拉尔夫·威廉·亨特

# 目 录

前言 · 001

第1章 中国改革、美国传教士与“女性的事业” · 007

第2章 献身传教 · 036

第3章 单身女性与传教群体 · 065

第4章 已婚女性与传教职业 · 108

第5章 家庭帝国 · 150

第6章 帝国福音 · 200

第7章 中国女性与基督徒身份 · 263

结语 中华女杰 · 292

译后记 · 305

## 前

## 言

与世界上其他人相比，美国女性担负着最多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的崇高使命，即拯救堕落者，“以美泽被四方”。

——凯瑟琳·比彻《家庭经济研究》（1842）

在为 19 世纪家庭妇女撰写的这部实用著作里，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赞扬了女性的宝贵潜能。女性的工作貌似卑微琐碎却不能出错：要做到尽善尽美，需要出众的能力。通过相夫教子，她可能改造美国社会；通过在学校、教堂等公众领域施展才能，她甚至可能改造全人类；在家庭之外，女性的教育与培养能创造出神奇的潜能去征服与挽救全世界。

正如比彻所言，基督教慈善帝国的女性志愿团体正投身于这项事业中，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各类女性团体将家庭妇女的零碎捐款汇集起来，用以资助女性在国外的传教活动。有些年轻的女传教士随丈夫前往亚非丛林，在异国历经磨难，甚至献出了崇高的生命，其英勇无畏深深激励着女性支持者。

内战后，美国女性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输送未婚女性到海外向异教徒传教。到 1890 年，普通差会的已婚女性和妇女传道部的未婚女性，总数已占传教士人数的 60%。

在女性传教士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开始意图国际扩张的美国也越来越重视传教活动。对于增长的工业产能与有限的美国疆域之间的矛盾，帝国扩张似乎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为美国商品提供新市场，为美国精神提供新挑战，也可以为美国文化提供新的道德教育的扩展空间。美西战争<sup>①</sup>再次激发了人们支持本已衰落的国外传教运动的热情。即使在领土扩张的热潮回落以后，传教运动仍持续为美国民族主义注入活力。

整个 19 世纪，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女性对于美国传教事业发展的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和在美国家庭里一样，女性传教时靠的是“神圣的感化”，而非直接以权威地位来压迫对方。她们的方式是亲密的、私人的，无须发号施令。她们将传教和家庭责任融合在一起，逐步灌输道德品格（即“拯救堕落者”），培养文雅情操（即“以美泽被四方”）。如同在家里一样，传教的女性不仅关注吃穿用度，而且注重品德教育。对家庭生活事无巨细的操持，使她们成为贡献最大同时也最成功的文化使者。正如一位司仪神父所说：“她们筑起的每一个家，建起的每一所学校，都是一堂生活艺术的实践课。”<sup>②</sup>

但是，美国放眼世界以图未来发展的转变，也对美国家庭的前景提出了挑战。为了传播爱的福音，女性走出家庭，改造世界；但在劳力市场动荡、城市拥堵和大量移民的背景下，家庭本身也日益脆弱。19 世纪后期，更多女性选择回归家庭而非走出家庭，以一种新有闲阶级的优雅礼仪来强化家庭关系。事实上，女性空间似乎受到了两股相反力量的冲击：要么走出家庭，打拼事业；要么回归家庭，享受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① 指 1898 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美国大胜并夺取古巴、菲律宾，势力从此拓展到东亚。此次战争激发了美国朝野的殖民热潮。美国以商业立国，除了 1848 年夺取墨西哥领土之外，一向不以占领他国领土为目标，但此一时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殖民热情。——译者

② Helen Barrett Montgomery, *Western Women in Eastern Lands: An Outline Study of 50 Years of Woman's Work in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p. 143.

帝国时代传播福音的女性，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很有自信；另一方面则不得不面对家庭的种种困境。她们怀着神圣的热情来到地球的另一端传播真理，教化民众，却惊讶地发现异国环境对美国家庭生活提出了诸多挑战。一边要忠于差会的职责，一边要极力维系女性生活的神圣核心，即家庭；终其一生，她们都在平衡两者的关系。她们斡旋于公共职责和家庭责任之间，摇摆于进与退之间，而这些恰恰构成了当时美国女性文化内部张力的生动场景。

自愿献身传教的新教女性<sup>①</sup>代表了本土美国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出身体面的女性投身传教工作，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或是受到神的召唤，或是由于家人亡故，或是嫁给了传教士，或是为应对单身处境。如同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其他美国女性，女传教士也参与建构由教会机构、女性杂志出版商、家用摆设制造商所强化了的民族女性文化。传教需要的是勇气和决心，而非标新立异，传教士在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上与美国的教师和牧师妻子有类似之处。

因此，女传教士的生活为对世纪之交女性文化感兴趣的历史学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不同于国内的教师，传教士与家人的信函（有的甚至长达几十年）保留了数量可观的生活记录。这些信函的内容包括对异国和教区生活的描述、对家乡的思念、对同胞的反思以及自我反省。由于身处新奇的异国环境，传教士清楚地记录了她们对忠诚、偏见、自我怀疑以及文化自信的思考。这些看法在国内不可能被提及，甚至根本不会想到。

女传教士海外传教旨在服务全人类，但跟男传教士的关注点不同，她们把精力主要放在使同性归信。她们坚信基督教负有提升西方女性地位的责任；对她们而言，传播福音不过是慷慨地分赠自己所得。正如有志愿者概括的，正是“异教女性的罪恶与身为基督女教徒的荣恩”激励着美国女性投身传教事业。<sup>②</sup>

<sup>①</sup> 美国以新教立国，原先基督徒以新教为主，但“二战”后天主教有了较大发展。——译者

<sup>②</sup> Rachel Benn, Deceased File,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Commission on Archives and Histor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adison, New Jersey (下文缩写为 DFMC)。



因为确信基督教对女性有益，世纪之交的女性传教团体算不上是有自觉意识的女性主义者，实际上更倾向于保守派。因为在千里之外扶危济贫，致力于解决贫困和疾病问题的女传教士无意于质疑本国社会。有些组织如妇女基督教戒酒联合会，主张女性参与投票选举，以妇女的影响力来反对酗酒；女传教士则不同，面对的是外国人、男性以及“少数”族群。这一时期投身传教事业的单身女性人数达到最高峰，大概是因为女性传教运动提供了一份体面职业，即使是对虔诚的牧师女儿也是如此。

不管怎样，世纪之交时，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前往海外传教，追随她们更为勇敢的前辈，成为美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新一代女性。1900年，这批英勇无畏的传教士大多是2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她们的贡献如今已经众所周知。诸多文学作品记录了这批女性的历程，如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等。保守的福音派传教士致力于海外传教，更为激进的妇女则活跃于国内的事业；由此她们拓宽了女性生活的空间，有更多机会发挥潜能。在前往国外的旅程中，女传教士的角色似乎是另一种帝国前哨。很多经济帝国的拥护者将亚洲视为解决国内剩余商品问题的倾销地，差会也可以为女性解决更为私人的问题——没被国内市场接受的女性能有个暂时的安身之所。<sup>①</sup>

---

① Karl E. Tauber and James A. Sweet, "Family and Work: The Social Life Cycle of Women," in *The American Assembly,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A Look to the 1980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6), p. 42; Mary Ryan, *Womanhood in America* (New York: Watts, 1979), p. 142. 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传教工作有时意味着更有机会获得比在国内更高的声望。瓦伦丁·拉伯（Valentin Rabe）认为，差会的存在“让普通人意识到了国际传教的重要意义并参与其中”。新教刊物《人与差会》（*Men and Missions*）1917年刊载的文章也支持拉伯的看法，文章强调，“比起过去，如今普通人有更多机会参与到世界性的事务中。伟大的事业不再仅仅属于伟大的人群”。“The American Protestant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1880-1920”（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65），pp. 167, 827。

本书以约 40 位女性的私人信函、美部会及美以美会<sup>①</sup>的档案为基础,探究来华女志愿者从最初投身传教事业到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在华传教士的生命历程。本书第一部分(第 1、2 章)主要是提供背景:第 1 章介绍传教的历史、美国的扩张政策与中国的改革运动;第 2 章分析导致女性前往海外传教的个人与人口因素。第 3 章和第 4 章描述来华传教的美国单身女性和已婚女性面临的不同身份困境:单身女性在集体生活中萌发了社会自主意识,而已婚女性则努力平衡传教职责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

无论已婚或未婚,身在殖民地中国的西方人都获得了在本国意想不到的权威地位。不管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租界(第 5 章),或是在中国社会(第 6 章),女传教士都体验到了宗主国带来的成就感,女性的从属地位由此逐渐动摇。第 7 章力图回答的问题是,女传教士对女学生和信徒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以此评判其事业成就。结语部分,分析在华传教对美中两国女性历史各有何意义。

由于本书大量征引的英文材料涉及不少中国人名、地名,保留原信和日记里的汉语拼写是较为妥当的做法。世纪之交传教士一般使用威氏拼音<sup>②</sup>,因而将相关中文翻译过来时本书也使用威氏拼音。

---

① 美以美会为美国北方的卫理宗教派。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卫斯理公教会分裂为南北两派即美以美会和监理会。1939 年,美国国内卫斯理宗三个宗派(美以美会、监理会及美普会)合并为卫理公会。1941 年,美国卫斯理宗在华的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等组成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本书研究时段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涉及相关名称时均译作美以美会。——译者

② 威氏拼音为英国人威妥玛所创,以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在 1958 年中国大陆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前广泛被用于人名、地名注音,影响较大。1958 年后逐渐废止。——译者



# 第 1 章

## 中国改革、美国传教士 与“女性的事业”

在世纪之交来华的传教士眼里，中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深陷于永恒的肮脏、死亡与堕落之中，到处弥漫着死亡的阴影。1913年，一名初次抵达古田的女传教士写信说，躺在尚未掩埋的棺材里的死人倒比活人还多。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到了一个死亡之城”。1900年，一名女传教士冒着暴雨来到福州，初来乍到，她整整哭了一夜，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声音在耳边挥之不去——病人惨叫，鸟儿悲号。哀悼者的恸哭在大小城镇彻夜不息。（一个女传教士在家信里说：“除非亲耳听到，否则你根本没法想象中国人的哀号。”）对死者的哀悼、弥留者的痛苦、丧亲者的恸哭，亲历的这一切让来自美国新大陆的传教士陷入了忧郁、惶惑和痛苦之中。有人写道，大多数传教士觉得“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令人沮丧”。<sup>①</sup>

---

<sup>①</sup> Elsie Clark to Andrew Krug, 8 March 1913, China Records Project, Yale Divinity School（下文缩写为 CRP）；Martha Wiley, interview, 1969, China Missionaries Oral History Project, Honnold Library, Claremont, Calif.（下文缩写为 COH）；Lucy Lee, “An American Sojourn in China”（printed memoir），CRP；Clark to Krug, 31 December 1916, CRP；Marjorie Rankin, interview, 1970, COH，其中回忆说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就是坟场和人们穿的蓝衣服。

眼前所见的中国，让传教士想到了遥远的历史。“据说叙利亚人蒙昧无知，不开化，像动物一样，也不过就是中国人这样吧？”埃莉斯·克拉克（Elise Clark）心想，“这些耶稣都见过”。有麻风病人来到露西·琼斯（Lucile Jones）面前摇着篮子乞讨，“有的没了手指，有的瞎了”，她也想到了基督教过去的记载。她当时想：“唉，《圣经》里确实提到麻风病人，但我以为那只是书里才有的。”她坐着轿子穿过稻田，穿过“满是泥坑和污秽的街道”，以及镇子的“街道、泥坑和垃圾”，教友在家里招待她，她却怎么也吃不下中国饭菜。“我快崩溃了”，她回忆。有人形容那是“一只脚踏进了20世纪，一只脚还留在公元前”<sup>①</sup>，比起之后在生活上遭受的压力，她们所经历的这些不过是个序幕而已。

传教士们感到迷惘，眼前的一切仿佛离奇的梦境，又是历史的噩梦。露丝·怀特（Ruth White）一开始游览佛寺见有人在“佛像”前焚香祝祷。她在家信里写道：“真觉得像回到了中世纪，那时的人全都膜拜偶像，这太奇怪了，简直不像真事”。<sup>②</sup>日本是艾玛·马丁（Emma Martin）到亚洲的第一站，在这里她有一种时空错乱的错觉，“我们见到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以至于后来再看什么都不奇怪了——甚至在这儿见到老爸老妈也不奇怪。有时我几乎想不起自己是谁，为什么来到这里。后来好几次都有这种感觉。”在亚洲所经历的一切如此格格不入，她们不得不去留意那些令她们感到亲切的东西。米尔德里德·罗兰（Mildred Rowland）写道，“有四种声音和家乡一样：雨声、鸦叫、蟋蟀鸣叫、婴儿啼哭”；只有自然界的聲音才能带她们跨越文化间的鸿沟。<sup>③</sup>

西方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一切感到奇怪和不安，中国人也对西方人的外

---

① Elsie Clark, diary, 24 September 1913, CRP; Lucile Jones, interview, 1970, COH; Guilelma Alsop, *My Chinese Days* (Boston: Little, Brown, 1918), p. 84.

② 基督教向来严禁偶像崇拜，传教士们对偶像崇拜普遍带有一种鄙夷与警惕心理。——译者

③ Ruth White to family, 29 March 1918, CRP; Emma Martin, diary, 27 April 1900, CRP; Mildred Rowland to family, 19 September 1911, CRP.

表——白皮肤、高鼻梁、深眼窝和卷头发——充满好奇与恐惧。就像西方人看待中国人一样，中国人觉得洋人像动物，像妖怪。鸦片战争时期，文雅的中国英雄林则徐在日记中提及，外国人“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有中国妇女回忆，“头次见那黑须的高个子，好像看到个妖怪，吓得一下子跌在地上，拿手遮住脑袋”。林则徐也认为外国人“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中国人给西方人起了个绰号叫“洋鬼子”，最初普遍存在的那种恐惧感由此可见一斑。<sup>①</sup>

双方对彼此样貌、衣着和习俗的惊骇印象影响深远，特别是在广阔的中国内陆，直到现在见到西方人还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在长期遭受厌恶的同时，世纪之交来华的传教士也经历了一次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戏剧性转变。虽然中国民众和传教士互不信任，但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改变敌视西方的态度，为传教士代表提供了更多保护。相应地，差会也为中国的觉醒而欢欣鼓舞，派遣了更多传教士来华。在扩大世界影响的竞争中，传教士被西方各国视为臂助，得到了政府高层前所未有的热情支持。尽管在整个帝国，传教士和中国民众依然保持着客气的疏离，但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面向西方的中国”也面临着一场美国文化输入的新浪潮。日渐壮大的女传教士群体在其间扮演重要的角色。早在1890年，女传教士已占来华传教士的60%，成为美国影响中国的宗教传播运动中的突出力量。



20世纪头二十年，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彻底逆转，大大推动了在华传教运动的繁荣。有历史学家将1900年视为中国由向后看的传统王朝转变为向

<sup>①</sup> Ning Lao T'ai-t'ai (宁老太太), *A Daughter of H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rking Woman* (《汉族的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 伊达·普鲁特 (Ida Pruitt) 记述编撰,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43; Arthur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68-69.

外看的革新国家的转捩点。随着清廷支持的义和团惨败，中国的权力天平从内陆的保守派向沿海的改革派倾斜。19世纪时，清廷曾想将西方各国纳入它的朝贡体系<sup>①</sup>之中；到了20世纪，它意识到，想要生存，就必须以西方的方式来抵抗西方。义和团运动后，中国转变策略，意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控制西方，对传教士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心怀不满，却尽量容忍。<sup>②</sup>

清政府之所以支持义和团，或曰义和拳，是出于借助拳民“灭洋”同时“扶清”的目的。义和团拳民坚信自己有刀枪不入的神功，在华北地区大肆围剿洋人，导致250名外国人和近2000名中国基督徒丧生。八国联军为营救被困者入侵北京，中国主权受到威胁。帝国几近瓦解的危险，看来教训了外逃的清廷。<sup>③</sup>他们返回北京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尊重西方的新气象。改革者张之洞的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堪称中国希望维护主权、增长国力的心声。<sup>④</sup>

中国统治者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始终大于对基督教的兴趣。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恰恰是中国力图避免的。然而，传教士是在华外国人最庞大的分支，一股不能以武力驱逐的势力（义和团的灾难便是前车之鉴），只能加以利用。中国想控制并利用在华的基督教势力。问题在于，是谁利用谁？一名差会发言人约翰·莫特（John R. Mott）在1911年写道：“中国人叫嚣着争取的，无非是西式教育，这不难实现。如果教堂能提供教育，顺便传播基督教，他们也会接受；否则中国人就会另谋出路。”<sup>⑤</sup>义和团运动之后，越来越多趋向现代化的改革者与官员向传教士征询意见，试图效仿。1911年辛亥革命后，

① 朝贡体系指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体系，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结束于19世纪末期。——译者

② Mary Clabaugh Wright, "Introduction: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ed. Wrigh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38, 书中将1900年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

③ 指1900年慈禧太后母子出逃西安。——译者

④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p. 517; John King Fairbank,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 635.

⑤ Paul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89.

中国对西方的兴趣进一步提高了在华传教士的地位。

推翻清王朝后，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辛亥革命的两派在处理外国人财产纠纷时格外小心谨慎。双方都认为，外国干涉可能导致中国分裂。民国成立后，越来越多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国人开始掌权，其中不乏基督徒。1911年前，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不能在政府任职，也不能参选地方官职。“发现了吗？现在我们有了真正的信仰自由，这种对待基督教和我们的态度变化多么激动人心！”麦美德（Luella Miner）后来写道。传教士长期忍受清廷的蔑视，自然高兴看到它覆灭。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还为新国民规定了一天作为基督祈祷日。这场革命似乎证实中国正在朝着现代化迈进。随后11年间，新教发展了20万名新教徒，差不多等同于此前一百年发展教徒的总和。<sup>①</sup>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著名民族主义运动并未直接威胁到传教士。实际上，很多传教士都担心日本对中国的觊觎，所以积极支持这次学生运动。传教士一直希望将西方爱国主义思想灌输给学生，五四运动即是学生受其影响的进一步证明。不过，这场民族主义运动也给在华教会带来了其他深远影响。随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明确强调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它宣称跟反科学的儒家传统断绝关系，这样，以往抨击在华基督教的言论又有了新的理论基础。<sup>②</sup>

1922年，“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新的在华基督教势力首次遭遇严峻挑战。该同盟的成员既有教会学校毕业生，也有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同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大会，触发了长期以来的反基督教情绪。当时，来自全世界基督教组织的代表齐聚清华大学，“非基督

① Latourett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p. 533; Luella Miner to family, 12 April 1912, Papers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下文缩写为 ABCFM); Sarah Goodrich to family, 20 October 1912, CRP;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9.

② 指新文化运动以科学的旗帜反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任何宗教，引发成一股毁灭神佛的浪潮。——译者



教学生同盟”借机发表声明，谴责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勾结，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走狗。<sup>①</sup>美国传教士虽然不承认这些指控，但1920年代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不过，从抵抗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到民族主义者的反基督教运动之间，即本研究关注的这一时期，传教士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并认为这来自信仰的天赐。他们在中国备受尊崇，坚信1911年辛亥革命后，天国比任何时候都近了。



中国比过去更乐于向西方学习，美国在华的传教士人数因此急剧增加；1890年到1905年间翻了一倍多，到1919年又再次翻倍，达到3300人。随着19世纪末美国的扩张，美国在华势力迅速增长，传教士重新燃起了对中国的兴趣，对从义和团运动灰烬中重生的“新中国”有着特别的热情。如果说过去美国传教士一直在争取中国人的注意力，那么到了20世纪初，他们采取的方式已经从过去对坚船利炮的依赖，转变为借助美国文化的巨大魅力来吸引中国人。美国政府首脑在战略上也支持这一转变，意图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在中国建立一个文化帝国而非政治帝国。<sup>②</sup>

19世纪30年代，首批抵达中国南方的美国传教士受到“第二次大觉醒”<sup>③</sup>的信念鼓舞，甚至支持西方人使用武力来实现传教目的。当时广州是中国茶

---

① Jessie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20-222.

② 相关统计数字，参见 Milton T. Stauffer, ed.,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in China, Made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Shanghai, 1922), p. 346. 这份详尽的数据调查表由一个国际性的新教委员会印制，是研究赴华差会最有价值的材料。1889年美国在华传教士为513人，1905年为1304人，到1919年增长为3305人。

③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兴起一次大规模基督教复兴运动，史称“第二次大觉醒”（“第一次大觉醒”为18世纪北美殖民地基督教新教复兴运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使教会人数增加，连带刺激了许多道德及社会慈善运动，包括海外传教运动。——译者